挑，初出茅庐的曹翠芬凭什么脱颖而出？

“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，演戏需要的内在条件我还是具备的。”曹翠芬说，“我比较容易相信规定情境。你提供给我一个环境，我能相信，然后我也有欲望去表演。我觉得这还是做演员比较重要的条件。”

那一年北电预科班的考场上，考官给她出了一道很生活化的小品题：到公园去玩，一条蛇突然蹿出来。

对于绝大多数未经世事的年轻考生来说，面对这类突发险情的小品，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是模式化的：大惊失色、失声尖叫、满场飞奔。但16岁的曹翠芬脑海里构建的却是一套严丝合缝的生活前情——

“我就想啊，我是怎么会发现这条蛇的呢？可能我在聚精会神干一件什么事——小女孩，可能正在把一朵喜欢的花、一片叶子摘下来，夹在书里头。然后隐约感觉到身边的青草堆里有什么东西在爬动，猛然发现是一条蛇……一下子就激动了。我小时候脸比较白，一激动就胀得通红，考官可能觉得我把害怕表现得挺真实的吧。”

考官们在长桌后看着这个因为恐惧而脸色通红的小姑娘，当即在打分表上做下了标记。曹翠芬顺利考入北电预科班，两年后直接升入本科。

本科毕业后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电影厂停摆，文艺创作陷入停滞。曹翠芬和她的同班同学们，被送到了河北蔚县农村的老乡家里。这一去，就是整整四年的水稻插秧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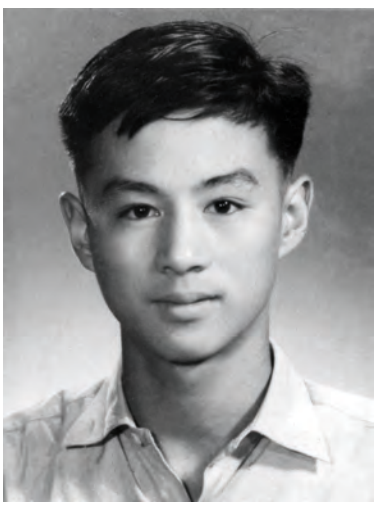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1973年，曹翠芬才终于离开稻田，跨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，参演故事片《南征北战》。对于真正从心底认同表演的曹翠芬而言，生活给予的磨难，最终全变成了银幕前的塑造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曹翠芬说，“在西北农村生活过你才知道，西北的妇女有吃苦耐劳的一面，但她们的情态和城市妇女完全不同。有个细节我观察了很久：西北妇女说话时，口型常常是‘O’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地广人稀，风沙大，人与人隔着几道山梁喊话，声音必须聚拢、必须大，口型自然张得圆。而像《上海一家人》里巧珍那样的棚户区妇女，就那么大点地方，一家人挤在一间屋，说话用得着喊吗？她可能就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，有什么委屈嚼碎了自己消化掉。”

后来，曹翠芬在银幕与荧屏上都迎来了大器晚成的爆发——在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，她是表面吃斋念佛、背地里杀人诛心的二太太；在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，她是撑起一府家规的盛老太太，举手投足尽是百年世家的威严、隐忍与慈爱；在《庆余年》中，她又是历经风浪的范老夫人，面对孙儿离别，那一个微微颤抖的额头轻触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理科男郭学鹏：被《红楼梦》截胡

计划经济时代，艺术教育界有个词叫“带戏招生”。后来名震电视圈的金牌制片人郭学鹏，就是一个被考官强行从名牌大学里“截胡”出来的幸运儿——当然，当年他可觉得自己是个“倒霉蛋”。

1963年初夏，全国高考在即。上海向明中学的走廊里，高三学生郭学鹏手里正攥着模拟试卷。他是个典型的理工男，物理拔尖，化学次之，对文科毫无兴趣。不仅数理思维出众，郭学鹏身形挺拔，剑眉星目，还是学校



右图：郭学鹏1963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时的入学照片。